

#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 走在香港史的道路上：「小歷史」的挑戰

蔡寶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我不是唸歷史學出身的，但由於鍾情於香港獨特的社會文化，故此與香港史研究沾上了邊。十多年來，我發覺香港史研究有邊緣化的特質，但正由於這個特質，使香港史具有挑戰及修正主流歷史的潛力。

香港史以香港社會生活及文化歷史為主體，相對於以大中華或大英帝國為主軸的史觀來說，這不啻是個很根本的挑戰。此外，香港史無論在教學及研究的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往往以週圍所見的人或事入手，因此研究或學習的過程是實在的、紮根式的。

傳統的讀史或治史方法，往往從既定的框架出發，由上而下地整理資料，把它們納入這個框架裏。這種方法認定其採用的架構，有普遍的解釋能力。至於新的資料，作用只是進一步鞏固這個架構，或充其量只是為它作小修小改而已。這種方法認定了一個宏觀的、有普遍解釋力的、由上而下運作的框架，我就姑名之曰「大歷史」。相對來說，以週圍的人或物為主體，從邊緣出發去整理出一個模式，而又不假設這個模式或圖像有普遍的解釋力，我就姑名之曰「小歷史」。

為了更清楚說明何謂「大歷史」及「小歷史」，讓我各自舉出一些例子。

先說「大歷史」。香港人最熟悉的，無疑是大中華文化這個論述。多年來，香港學生所唸的中史科就是以這個論述為「主導思想」的。在這個論述

裏，一開始就存在著稱為「華夏」或「中國」這樣一個延綿不絕的抽象文化主體。這個主體內的人（「炎黃子孫」）被想像為有極高的同質性。至於這個主體本身，無論經歷多少政治分合或變遷，它仍然是屹立不倒的。當然，這個論述不只是學術範疇的事，而是與實際政治角力（realpolitik）息息相關的。我們不時聽到中國政府說，某某地方「從來都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就是這個華夏大論述在政治層面的應用。

另一個「大歷史」論述的例子是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也是仗著作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而流行於中國大陸。我曾經參觀過幾個國內的歷史博物館，都是以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革命後的共產主義社會）為展覽主軸。至於國內學校的歷史教學，也是以此為組織架構。相對來說，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學，則以傳統的朝代更替循環為論述的主軸。

「大歷史」論述當然也有政治以外的作用，在學術研究的範疇裏，它提供研究及整理史料的框架、同時也指導研究的方向。可是，沒有實在的、紮根的「小歷史」，「大歷史」的論述便不能更新，因此也會變得僵化，最後喪失解釋力。我覺得目前的香港史研究就具有這種更新作用，且舉個我較為熟悉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一個對大歷史最明顯的挑戰來自婦女口述歷史。新婦女協進會於一九九八年出版《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一九九八年)，由十位婆婆的訪問錄音整理而成。這本書的導言，開宗明義就提出從女性主義及口述史的立足點出發，對傳統歷史的挑戰。它第一個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香港歷史總離不開「鴉片戰爭、南京條約、荒蕪小島、英殖割據、中日戰爭、香港淪陷、戰後重建、經濟起飛、繁榮安定、九七回歸——這是誰的歷史？」作者們的結論，就是這些往往只是接近政治權力的「大人男人寫的歷史」，而這種歷史的表面作用雖然是「紀實」，但實際作用卻是「建立綱目，指點江山」，也因此充滿空白、偏見、無意的謊言、甚至肆意的專橫，和支持官方權力的神話。」(頁3)

基於此，作者們說，「如果我們不想再強記他人杜撰的大是大非、官威神話，我們得改寫別一樣的歷史。我們需要一種小寫的歷史、女性的歷史。」(頁3)

究竟這種「小寫歷史」的挑戰在哪裏呢？

首先，婦女歷史是實存的，是活生生的人從歷史中走過來的紀錄，而很多時候，歷史實實在在地在婦女的身體上留下印記，形成不折不扣的 embodied history。所以，這部阿婆口述歷史記錄了各自女性身體轉變與身處的男性文化社會的互動關係——月經、貞操、婚姻與性、戰爭對身體以至貞節的威脅等等。相比之下，男性的「大寫歷史」則只「勾劃結構變遷。男性的朝代更替」(頁3)，與人的真實存在距離很遠。

在這個抽象的框框裏，不單止人的實在經驗消失了，人的主體性也被忽略。相反地，小歷史卻通過記錄個人的掙扎和抉擇，回復人的主體性，而女性口述歷史更進一步糾正男性主流歷史的偏頗。這部阿婆口述歷史就敘述女性多年來如何在戰亂、遷徙及貧困中奮力求存，以至選擇香港作為逃避不如意的婚姻、又或是混亂和不明朗政治環境的出路。香港不單是男性尋求生存的經濟避難所而已。

在這部阿婆口述歷史的寫作過程中，作者更體會到「歷史直線」的虛幻，而這正是大歷史一向所假定的。十位阿婆中，有一位不斷強調她有一百零六歲，但仔細核對她一生重要的遭遇與大歷史事件(如香港淪陷、大陸解放等)相接的年份時，卻又發現她這個歲數是不可能的。當訪問者多番要求澄清時，阿婆不悅地批評她們「真蠢」、「不明白」；她只管說「我說我喜歡說的」(頁103-4)。如此一來，什麼才是歷史的真實呢？正如這個故事的記錄者所說：

「我們以為女性的口述歷史可以重現壓抑了的歷史，但口述歷史的游移、不可信、自說自話，是對『歷史』這一知識概念最大的顛覆——知識是對不可知的摸索，然而越摸索越黑暗，越曖昧難明，越不可知，我們是在越不可知，越顛覆否定中，知得更多的。我們無法再安於我們對『歷史』、『真實』的理解。所以，她所說的，比她說的，更為多。」(頁104-5)

最後，想提出小歷史的書寫對參與者以至讀者的自我肯定及強化 (self-empowerment) 作用。且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參與寫作的《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 作為關於弱勢社群(工廠女工)的歷史，這本書的成書過程，從開始就很自覺地是「一個平等、共同參與的計劃，揚棄學院精英式手法」(頁11)，通過上夜校的女工本身的網絡和自主參與和設計，搜集資料，然後借助一些外援的人手，完成書寫的階段。其中一位參與者，也是當年一位上夜校的女工，就這樣總結整個計劃對參與者所起的作用：

「回首過去，並不只於懷舊而已，而

是要從自己的經歷，汲取足夠的力量  
和教訓，讓我們無畏地重新上路。」  
(頁12)

一位有相同經歷的七、八十年代女工，現任工  
會祕書張麗霞，就不約而同地在前序中這樣說：

「在工會運動中，每天向著『偉大』  
的目標進發，極少有機會溫馨的回望  
過去，細意咀嚼自己的童工年代，特  
別是少女成長階段。看過這本書後有

暖暖的、很親近的感覺，同時，更覺  
得我們這群女性的『腰骨』和『腳  
骨』很硬淨，很為大家能站立至今而  
驕傲。」(頁6)

這種自我肯定及強化的作用，當然不止於弱勢  
社群的歷史書寫。自從初中引入香港史後，不少老  
師也要求學生就自己熟悉的人物、社區、組織等，  
進行小規模的歷史專題研究。從以上的討論來看。  
我們可以了解到，這種小歷史的書寫經驗所帶給學  
生的，豈只是學習搜集資料、整理和書寫報告的能  
力而已？

---

##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結業禮致詞

廖迪生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在1997年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以「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為題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申辦了這個促進大學與中學間知識交流的中介計劃。(計劃簡介請參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13期，頁5-18。)將大學裡教授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的知識與中學老師分享。在整個活動中，我們共安排了九個講座、八個田野考察、一個由大專院校學者與中學老師參與的研討會、一個展覽及數個書展。今天是畢業典禮，我們很榮幸得到科技大學吳家瑋校長及教育署人文學科組陳家琪總監為我們頒贈證書。我們也同時邀請了蔡寶瓊主講「誰人的香港史？」、幾位中學老師進行教學示範、並且安排了書展和教案展覽。

我們的一系列活動由1998年12月開始，直到今日的18個月時間裡，老師們努力不懈，風雨無間的參加了不同的講座及田野考察。足見老師的興趣、毅力與熱誠。

在講座安排方面，我們請到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的學者義助講授香港史相關的題目，由文物古蹟、傳統社會組織與生活、都市商業發展、日治時

期、戰後經濟與社會、普及文化及身份建構以至香港史的理論與實踐等，其內容包涵了教授香港歷史的各主要層面。

田野考察方面，地點有東至西貢，北至上水林村，西至大澳。考察的不單有歷史悠久的農村社會，還有香港經濟中心的中上環，也有發掘在泥土下面的歷史社會文化遺物，這些活動讓老師們親身體驗到田野考察的實況及其意義。

在舉辦這些活動的同時，我們安排了一個證書課程，但由於人手及行政上的限制，我們只可以容許40位老師參加，對不能參加的老師，我們致萬二分的歉意。很多老師都很有毅力，參與百份之七十或以上的活動，並完成編寫一個教案，達到證書課程的要求。但更值得高興的是很多不是證書課程的老師，都能次次出席講座，當田野考察有空位時，便積極報名參加，他們更不計較有沒有證書。他們的熱誠，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除了參加講座和田野考察之外，我們要求參加證書課程的老師提交一份香港史的教案。很多老師設計了精彩的教案，並先在自己課堂上試教、修